



中國文化論壇

中国大学的 人文教育

甘 阳 陈 来 苏 力

主编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G40-012

1



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

主 编 甘 阳 陈 来 苏 力

执行主编 李彦华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甘阳，陈来，苏力主编.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8

(中国文化论坛)

ISBN 7-108-02545-0

I. 中... II. ①甘...②陈...③苏 III. 人文学—教学研究—高等学校 IV. C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1526 号

责任编辑 张志军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32.25

印 数 0,001—5,000 册

字 数 520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总 序

进入 21 世纪，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文明对于这个时代的人类历史能够做出怎样的贡献？这些问题萦绕在许多关心中国与世界文化命运的人的心头。正是出于对于当代中国现实和文化处境的关怀，由周凯旋、董秀玉两位女士发起，我们于 2004 年成立了中国文化论坛，由周凯旋女士与董秀玉女士任论坛理事会理事长，陈来、陈春声、甘阳、黄平、刘小枫、童世骏、王晓明、王绍光、汪晖、余永定、苏力任理事会理事。著名学者杜维明、金耀基、李泽厚、王元化、韦钰、许倬云、杨振宁等先生应邀担任论坛顾问。

论坛经过反复讨论确立了中国文化论坛的基本宗旨，即立足于 21 世纪中国文明的历史处境，以跨学科的合作方式，从具体问题切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我们也可以用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这一命题来界定所谓“对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这个“自觉”并不仅仅是对某种抽象的文化原则的认同，它毋宁产生于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产生于对当代世界的历史形势及其未来趋势的全面把握。因此，“文化自觉”这一命题中的“文化”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和其他领域的方方面面；这一命题中的“自觉”表达的是在全球化的处境中对于中国的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而这一关切和思考不可能不涉及中国如何在开放条件下寻求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等领域的独特的变革道路这一现实问题。

我们强调中国的变革有着自身的“独特的道路”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基本认识：第一，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又经历了现代的革命和30年的改革，中国的变革必然是一个立足于自身的传统和现实而展开变革与创新的过程，那种简单照搬现成模式的方式不仅在历史中曾经导致灾难，而且也会在现实中将中国的变革引向歧途；第二，当代全球化浪潮包含着一种支配性的逻辑和同质化的趋势，中国的变革一方面离不开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的学习和借鉴，但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开放性中确立自身的自主性。所谓“和而不同”，表达的正是这种开放性与自主性、关联性与多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将近一百年前，年轻的鲁迅这样写道：“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一百多年来，在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 and 实践中反复回旋的不正是这一持久的关怀吗？事实上，只有基于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人们才能避免盲目的自卑与自大，真实地理解我们置身的这个多样性的世界及其面临的挑战。

论坛将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每年就某一具体问题举行一次或两次年度论坛和多次小型讨论会。理事会将根据具体主题确定负责该年度论坛组织工作的主席人选，并协助他做好论坛的各项准备工作；每届论坛的主题由理事会和顾问们在广泛征求意见并深入讨论的基础上确定。论坛将根据不同的主题，邀请知识界的同道，展开深入的、跨学科的讨论，力求突出思想文化的内涵，提出前瞻性的问题，并在每届年度论坛结束后编辑出版相关主题的论文集和其他出版物。

2006年6月

序一 大学教育与文化自觉

杨振宁^{〔1〕}：

“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是一个非常及时的题目。

今天全世界都知道，目前世界上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从中华民族讲起来，今天是一个大时代，也许是历史上少有的大时代。我在西南联大念书时就认识冯友兰先生，他的《三松堂自序》我极力推荐给大家。在这本书的最后，冯先生再三讲，他在晚年的时候喜欢“旧邦新命”这句话，语出《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他所以特别喜欢“旧邦新命”这句话，当然是因为他觉得：今天中华民族是一个旧邦，可是有一个新命。

西南联大的校歌里面有这样几句：“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我想，今天我们应该把它稍微改一改，是“千秋耻，既已雪；中兴业，须人杰”。这个“中兴业，须人杰”就表示了今天全国大学的责任，要训练出一些人杰，能够帮助中华民族创建一个史无前例的中兴业。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贝德说：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 Geopolitics（地缘政治）事件。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看法。

以上这些，是一个原则性的、对于整个世界发展的重要的认识，可是在清华待了一年半以后，感觉到很多的大学生对于这一点似乎不够认识。对这点不够认识，对他们的前途有非常重要的、长远的、广泛的

〔1〕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文化论坛顾问。

影响。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在大学的教育中，加入或注意一些事情，使得更多的大学生了解今天的世界是什么局势，今天的中华民族是什么局势，他们希望自己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我觉得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当然也是论坛以后几天特别要讨论的问题。可是有一个简单一点儿的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可以提出来跟大家讨论，这就是大学教育必须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这是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他后来很喜欢这句话，所以他在一些文章中特别阐述了文化自觉是什么意思。

每一个中国的青年，在中国的环境之中长大，他浸淫在这个文化中，所以毫无疑问地受到这个文化的影响，是这个文化的产物，可是不代表他就对于这件事情有一个认识，这就是费先生之所以特别要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我觉得今天的大学教育，应该把文化自觉灌注到每一个大学生身上，使他知道他自己是怎么回事，他所处的社会又是怎么回事。

怎样才能达到文化自觉的教育方针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想以后几天一定有很多的讨论，但是我想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首先要培养广泛的兴趣。我过去一年半在清华，越来越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而且我曾经在中间教了一学期的大一物理，所以对于清华的一部分大一学生有相当多的接触，对于他们有些了解。他们跟美国的大一学生有两个很大的区别：一个区别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的中学教育是非常扎实的，所以我的那些学生的三角、几何、解析几何都学得非常好，这与我美国所教的学生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过还有第二点区别也许更重要。清华的一年级学生比起美国的一年级学生要成熟得多，他们很努力、很自发地去多念书，可是这种训练、这种成熟的程度所得出来的结果，使他们有个向钻研型的、向一个狭窄的专业走去的倾向，这与美国的学生是截然不同的。

我个人觉得，中国的教育政策、中小学的教育政策所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有他们的优点。刚才讲了，他们准备很充分、他们很成熟，这些毫无疑问是优点，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他们太专，太把向狭

窄的专业走向当做他们最重要的前途和方向。我要提出来的，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从大学的教育方针讲，应该多灌注一些方法，多灌注一些程序，使得多半的学生能够从狭窄的专业钻研之中走出来，使得他们对于两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经济有多方面的认识，从而达到文化自觉的地步。

培养广泛兴趣，除了刚才我所讲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增进创新的能力。现在国内到处、天天都在讲要培养创新能力，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个人觉得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到今天的学术界前沿非常之广，10 倍于 50 年以前，百倍于 100 年以前，今天的很多学科和教科书，在 100 年前是完全不可能有的。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新学问多得不得了的今天，不管是科学、工程、人文都是这个样子，在这样复杂的情形之下，要想产生出真正有创新的想法，必须要培养广泛的兴趣。很多人都觉得中国的学生与美国的学生相比，比较缺乏创新能力，如果此话有一点儿对的话，我认为与中国学生从小被训练的时候太集中、太狭窄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要提倡创新的话，一个重要的事情也许是希望在大学中培养学生有广泛的兴趣，而中国的教育传统，过去在这方面特别欠缺。

（注：本文系根据杨振宁先生在中国文化论坛“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讲整理）

序二 对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期望

韦钰^[1]：

在我们现在的新课程标准里已经把知识、探究技能、价值取向三个方面确定为科学教育的目标。我最近发现科学精神这种提法原来是中国的特色，据樊洪业先生考证：在中文文献中最早提出“科学精神”一词的是留美学生任鸿隽先生，时间是1916年。对科学精神的内涵研究的人很多，我认为核心就是求真，实事求是，追求真理。蔡德成先生把科学精神扩展成六个方面：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和宽容的激励。我觉得这很多属于人文精神范畴。我对比了美国先进科学协会的提法，他们对儿童通过科学教育要达到的科学态度，与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十分相近。例如：好奇心、尊重事实、批判性思维、灵活性、对变化世界的敏感、尊重生命和对环境保护的觉醒等。

所以，我觉得科学教育不是说不讲精神只讲知识，如果只讲灌输知识不叫科学教育。科学精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管你通过什么样的教育去达到它。

去年在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召开了一个有关教育发展趋势的研讨会，会议认为：在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和社会所有的方面应该建立一个对话的平台，因为我们相信现代的社会思维必须要建立在阐明我们社会行

[1] 中国教育部前副部长，中国文化论坛顾问，本届论坛名誉主席。

为根源的科学知识之上。我想，今天的会议就是这样一个平台。

我20年前是从事生物学、医学和工程交叉学科研究的，在东南大学建立了一个生物医学工程系和分子与生物分子实验室，现在它已经建成国家实验室了。我现在是没事干找事，从事生物学和教育的交叉研究，这就是“神经教育学”，因为译成中文不好听，所以改用它的另一个名称“学习科学”，现在国际上有两个很大的网络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我特别对儿童的情感发展感到兴趣，对通过科学教育培养儿童的情绪能力感到兴趣。这些离我们有多远呢？不远，尽管我们国内教育界接受这个学科的人并不多，但是美国的伊利诺伊州已经把情绪学习列入教育标准，而且有很详细的学习指导计划。小孩在小学的初级阶段和后面的初中、高中都应该注意培养什么情感？我觉得在教育里面，至少在基础教育里面——在大学里面这种问题应该不是问题了——两个方面是最重要的：一个是热情，一个是责任心。这是最最重要的。这就是我现在非常热衷于做5岁到12岁儿童的科学教育工作的原因。

我想表述的是科学教育中也有人文精神的培养，在人文精神的培养中也需要科学教育，例如，人文学科中有很多涉及价值取向。情感是价值取向的基础，我们的情感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创新、健康、暴力犯罪和人际关系，它有没有生物基础在我们大脑里？情感在脑中是有生物基础的，它需要从小培养起。科学教育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里进行的，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是不可以分开的，未来更应该是这样。

李学勤^[1]：

我认为，第一届中国文化论坛选择“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作为议题，不是偶然的事情；而且得到这么多的专家和学者的光临和支持，也不是偶然的事情。这反映了现在的一个趋向，就像刚才杨先生说的，在中国走向崛起，受到全世界瞩目的条件下，大家对于我们的大学教育，特别是对大学培养人才的素质方面的教育特别关切、特别重视，我想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就是说大家重视大学教育，对于我们在仅仅过了几年

[1]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主任。

的新世纪里，进行与国家发展前景相关方面的讨论确实是很重要的。

我接触到的今天的大学生，有一个很明显的功利化倾向。他们可能从很小的时候，甚至有些从幼儿园的时期就受到一种熏染，结果就让他觉得以后所有的学习和工作都要与个人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这个倾向相当普遍。

还有所谓的“史学危机”，所谓“历史有什么用”的说法，在我个人看起来和其他的一些人文学科一样，实际上是一个与功利化的思想有关的问题。而对这种功利化的思想怎样进行教育和引导，本身就是一個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问题。刚才杨先生谈到一种狭窄的学科专业倾向，我们现在的大学专业越分越细，而且有一个特点是各个专业间不相往来。专业越分越细，越分越碎，互相分割的状态是不符合大学本质的。所谓“大学”，本身从字根上说就有一个普遍的意思，本身应该包括各个学科或者作为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来研究，从这方面说，我们所走的道路有很大的问题。

我曾经想起来用《庄子·天下篇》中的一句话，叫做“道术将为天下裂”。现在看起来“学”也将为天下之裂，裂了，道术就不存在了，那么整个道术的水平就下滑，甚至于消失殆尽了，这对我们整个学术的发展是很为不利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概念是一个整体，科学是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研究的整体认识，不能是细碎的、分成一个个小的学科互相不相往来。恢复这样一个概念，才有可能使现在在各个不同学科领域里面发展出来的尖端技术互相有所交叉而产生新的学科和技术。

周凯旋^[1]：

爱默生曾经警告过，上帝把思想家放在地球上，大家可是要当心一点儿。如果我们扮演不了在体制与自由之间的一个复杂的共通性的生存关系的探索者，而只沦为在立场与文字上的一些互相攻击；或只有人文精神的表象，而不是建造人文精神的内心，我也不会觉得是一件太好的

[1] 中国文化论坛理事长。

事情。苏拉底格和柏拉图曾经这样认为：世界上现在有很多诡辩者，就是很多懂得颠倒黑白、搬弄是非、很不负责任的人，这是很危险的事。刚才杨振宁教授在说到狭隘的专业跟压抑创意的关系，我自己听了认为狭隘的心是更可怕的事情。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如果只有封闭思维的人，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回归到我们传统文化的根源中，和西方学理比较、探究、更新，而非简单地将西方的人文精神的各种理论和形式加注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就我个人意见，觉得在普遍缺乏独立判断的教育传统内，人文精神四个字往往会变得空泛。

我很相信中国人的人文精神的基因是早存在的。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革命应该是一场心理的工程。我也不是工程师，但我觉得如果是工程的话，蓝图是很重要的。也许我们的责任不是人文精神的各种立场的研究，而是帮助制定蓝图，帮助我们民族解决人文精神在传统文化内的各种结节。我觉得人文精神最珍贵的、最无价的力量是让自身心灵的高贵为善良的力量来效力。我们心力的进步是有赖我们心理工程的蓝图和建设。我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就是希望全球的人能珍惜我们这个可爱的民族的各方各面，而不仅仅是珍惜我们庞大的市场。

董秀玉^{〔1〕}：

中国文化论坛创立的初衷是文化关怀，希望对文化学术界一些众所关注的重要问题进行跨学科的交流 and 深入的、建设性的讨论，以期对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略尽绵薄。

论坛创立之前，我们征求了费孝通先生、李泽厚先生、许倬云先生、杜维明先生、王元化先生等学术界的前辈，以及学术文化界很多朋友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赞同和支持。这个事业更是得到了周凯旋女士、周凯旋基金会的积极资助。

中国文化论坛设立理事会，由理事会提出并通过每年的论题，决定当年的论坛执行主席，由执行主席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并由秘书处协

〔1〕 中国文化论坛理事长。

助操作。

论坛还诚意聘请了著名学者杜维明、金耀基、李泽厚、王元化、韦钰、许倬云、杨振宁等先生为顾问，指导推动这一文化研究的项目。

第一届中国文化论坛的主题是“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本届论坛不但有全国各大学在实践第一线的教授、学者的热情参与，还有不少大学同学们的积极参加。我想这是我们大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学者、教授和学生共同来讨论、研究这个问题。理事会希望本届论坛不但是一个跨学科的研讨会，也是一个教学实践的经验交流活动，更应该是一次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观念激荡。

（注：以上文字系根据每位演讲者在中国文化论坛“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会议开幕式上的发言整理）

导言 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

——首届中国文化论坛的缘起、目的与问题

甘 阳 陈 来 苏 力

受中国文化论坛理事会的委托，我们负责筹办主持了2005年6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的“首届中国文化论坛：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会议。值此会议论文集结集出版之际，我们愿在此简略说明一下中国文化论坛理事会决定召开这次会议的基本出发点，以及这次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一些主要问题。

中国文化论坛理事会的成员主要来自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各自从事的具体研究相当不同，但在有关教育、大学和中国的文化发展问题上，我们大体上有一些初步共识。首先，我们都高度认同前辈学者费孝通和杨振宁等先生在世纪之交提出的“文化自觉”问题。按我们的理解，所谓“文化自觉”至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今天的中国人需要了解，中国经济的崛起并非仅仅只有经济史的意义，而是具有世界文明史的意义。现在全世界都把中国的崛起看成是21世纪的最大事件，认为中国的发展可能会决定性地影响和改变整个世界格局。对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这种地位，中国人必须要有自觉的意识，要自觉地从世界文明史的高度来看中国和世界，要自觉地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来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世界。第二，更重要的是，提出“文化自觉”是要指出，我们国家目前的文化状况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很不相称，我们的文化基础非常薄弱，我们的文化底气严重不足，我们的文化历史视野更是相当狭

隘。因此，提出“文化自觉”不是要助长文化自大狂，而恰恰是要反对文化自大狂，反对文化浮躁气，反对文化作秀风。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提倡的是从非常具体的事情着手，做耐心扎实的文化奠基工作，要特别反对吹牛皮，说大话，搞花拳绣腿。

其次，中国文化论坛理事会的成员在教育 and 大学改革的问题上的基本共识是主张采取稳健和务实的态度。我们都知道，有关中国教育和中国大学的问题近年来一直是整个社会的关注焦点之一。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大学要改革的呼吁，而事实上中国的大学也都一直在不断出台各种改革方案。但我们以为，教育的问题并没有捷径可走，教育的提高不可能采取搞样板工程的方式追求速成的效果。任何改革都有其代价，都有机会成本的问题，同时，改革的实际结果往往难以预测。因此在教育 and 大学改革的问题上，比较稳健务实的道路是“逐步调整，小步改革，通过改革调整的实际成果为进一步的改革创造空间，最终形成适应中国社会需要的比较完备的制度”。我们因此并不是以大学改革者的身份自居来召开香山会议，而是以教师和学者的身份来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按照我们的看法，今天我们大学存在的许多问题，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彻底解决。任何急于求成的改革，往往都事与愿违，不但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摧毁原有的基础。教育和大学的完善需要时间，需要经验的积累，尤其是，一所好的大学首先取决于能否养成一个好的传统，而传统的形成本身就需要时间。

从以上这种稳健务实的共识出发，我们在筹备这次会议时特别强调希望与会者更多从积极性、建设性的角度着眼来讨论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问题。我们每个人近年都参加过不止一次讨论大学问题的会议，根据我们的经验，在今天中国的环境下讨论大学问题，往往很容易流为牢骚会和诉苦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今天的大学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我们同时认为，如果我们的大学讨论仅仅满足于抨击一些人所共知的大学弊端，仅仅只是惯性地重复一些永远正确的表态性批评，那么我们不仅无法提高讨论的水平和质量，而且很可能在批评的同时陷入某种非常简单化的思维。这种简单化的思维会以为只要某个问题解决了，大学的一切问题都会解决，或只要某个问题不能解决，大学的任何

努力都是无效的。我们不能认同这种看法，因为这种把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实际只能导致我们无法真正深入大学人文教育的内在问题。我们认为，大学的人文教育有其自身的问题和内在困难，这些问题和困难并不是其他的体制改革可以代替的。例如，即使大学的行政体制和人事聘任体制都理顺了，也并不表示大学的人文教育就会自然而然地走上轨道。我们因此希望这次会议能深入讨论大学人文教育的具体问题和内在困难。

这里我们必须正视美国大学教育理论家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早已指出的现代大学本身的基本问题，即现代大学不像传统的书院那样是一个单一的共同体，而是由诸多相互矛盾的亚共同体所组成。用克尔的话讲，一个现代大学包括：“本科生的共同体，研究生的共同体，人文学者的共同体，社会科学家的共同体，自然科学家的共同体；职业学院的共同体；所有非学术人员的共同体，以及大学行政干部的共同体”——所有这些不同的共同体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张力和冲突。“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复杂性实际就在于，它几乎涉及上述所有不同共同体之间的矛盾。讨论“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问题，实际涉及如何调和或理顺大学内部这些不同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如何使大学内部的不同共同体之间能够取得一个比较均衡的发展。我们在这次会议上曾提出，发展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可能会面临七个复杂关系或矛盾：第一，大学人文教育需要考虑大学与中学教育的关系；第二，大学人文教育必须首先澄清和理顺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关系，特别需要明确“本科教育”有其独立的培养目的和目标；第三，大学人文教育必须理顺人文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特别需要认真考虑法学院和商学院这些职业学院在大学中的定位问题；第四，大学人文教育需要重新考虑文—理关系；第五，大学人文教育进入课程设置，将会凸显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矛盾；第六，大学人文教育的展开一定会重新提出百年来的老问题即“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第七，大学人文教育必须处理好人文教育课程设计上的纲与目之关系。所有这些问题都非常具体而且比较复杂，而且大多涉及大学内外各种不同共同体的矛盾。因此，今天讨论大学问题，不宜采取把一切都一锅煮的态度，而需要首先明确我们所要讨论的大学问题究竟涉及

大学内部哪些亚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和张力。

从香山会议的讨论情况来看，澄清和理顺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关系是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关系。这里涉及的实质问题是大学中的“本科生”究竟在大学中处于什么地位，以及我国大学目前本科教育的目的和目标到底是什么，这可能是我国大学人文教育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所谓“大学的人文教育”，主要指的是大学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具体而言可以说“大学的人文教育”主要落实为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阶段的通识教育安排，因此如果大学本科第一年开始就着重专业教育，那么“大学的人文教育”事实上就难以落实。近年来虽然很多高校都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本科教育要走向“淡化专业，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高年级实行宽口径专业发展”的转型目标，但从目前实际效果来看，“淡化专业”实际上很难做到。这里的原因在于，目前很多大学都把本科教育的目的看成就是培养研究生的生源。这种指导思想是值得重新加以检讨的。严格地说，这种指导思想是难以成立的。首先是报考研究生的学生比例问题，目前我国大学本科生考取研究生的比例是有限的，如果把本科培养目标看成是培养未来的研究生，就没有顾及大多数今后不读研究生的本科生的培养。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指导思想实际仍然是以往强烈的“专业主义”教育思想和传统的延续，没有真正把大学本科教育阶段视为具有独立的目的是和目标，而是对本科教育的目的和目标含混不清。实际结果是把以往的“专业主义”转移了一个层次，大学扩招后，大学本科变得相当于过去的高中，而研究生则变得相当于过去的大学本科，因此一切仍然强调的是专业教育，这就不大可能建立真正的大学本科通识教育制度和传统。目前中国的大学本科生已经超过两千万，如何改善大学的本科通识教育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提出“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可以说首先就是强调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的重要性，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国大学本科阶段相对独立的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这是目前中国大学人文教育面临的最基本和最突出的问题。

另一个突出问题则是如何处理人文通识课程设计上的纲与目之关系。大学人文教育的真正落实必然体现在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上。